

論教育質性研究報告 另類書寫的合理性

吳麗君*

摘 要

傳統學術論文的寫作格式有其特色與值得肯定的長處，但是在肯定多元、重視差異的後現代氛圍下，傳統的論文撰寫格式不宜再霸權地宣稱自己的唯一合法性。這篇文章旨在解構、鬆動科學式研究報告的書寫，並挑戰其唯一合法性的霸權地位。

本文從研究者自身的困境與關懷切入，試圖為教育質性研究的另類書寫找尋安身立命的合法位置。檢視質性研究書寫的現況後，作者從四個面向來為質性研究的另類書寫請命，它們分別是：功能性的考量、語言本質的轉折、權力的思索以及另類書寫這種具有跨界性質之文類的創造性。

文末借用 Handy 的語言來做為代結語，他說：「也許我們需要一個大地震，來挑戰一切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務」。期待學界以遭逢地震之後的心情，用更寬廣的視野來看待教育質性研究的書寫。唯承認質性研究另類書寫的合理性，並不意味著它可以免除評鑑或檢視，期待所有的研究都能夠在一個更合理、更公義的權力結構下發榮滋長。

關鍵詞：質性研究、另類書寫、跨界、語言、再現

* 吳麗君：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初等教育學系副教授

論教育質性研究報告 另類書寫的合理性

吳麗君*

壹、前言

一、為何探索質性研究的另類書寫

民國八十八年我以英格蘭地區的學習評量為主題，寫了一篇實際走訪英格蘭數所小學之後的短文，篇名是：夢裡故事說不完-英倫評量的邂逅。台北師範學院的學報把文章送審之後，回來的意見之一對於報告內容給予相當的肯定，但是對於書寫的方式、風格持保留的態度。很誠實地說，當時這一個意見讓我的心情黯然而許久。民國八十九年，我未記取教訓又以比較另類的風格寫了「毀/謗人不倦—師範學院潛在課程之個案研究」，並打算在海峽兩岸高等教育發展與改革研討會上發表。發表之前，我請一位在質性與量化研究均有深厚素養的朋友幫忙先行閱讀並給回饋。因為是好朋友，所以她率直地以e-mail告訴我：「我感覺它像報導而比較不像研究」。質性研究被批評為印象的、主觀的、新聞報導式的報告，甚至被認為不科學、軟性與直覺等等，早已經是學界耳熟能詳的論述(高敬文, 1996)。生活在當前的學術環境之下，沒有人能夠逃避這一個共業，我的研究報告必須面對這種批判與審視；當我審察學生的論文，或擔任學生的論文口試委員，也必須不斷遭逢這些價值的撞擊。有趣的是，在我開始懷疑自己的論文寫作風格之際，上面所提及的夢乙文獲得部分學界人士的肯定，得到國科會的學術研究甲等獎勵。對個人而言，這當然是一個美好的鼓勵，但是除了鼓勵之外，從中我也見到了國內教育學術圈對於質性研究撰寫的態度正在逐漸地轉變之中，而近來敘事性探究(narrative inquiry)的風行更見證了這一種趨勢。在這些事件的背後值得深思的

* 吳麗君：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初等教育學系副教授

是：質性研究的另類書寫只是一種流行嗎？無可否認學術界也會有流行的現象，除了流行之外有沒有更正當、更嚴肅的理由來支持它呢？這也是我進一步去了解這一個議題的動機之一。奠基在個人專業旅程上的這些掙扎與困惑，我進行了這一趟教育質性研究報告書寫的探索之旅，啟程是為了解惑。因此，這是一趟從我個人主體出發的意義追尋之旅。

從比較抽離的角度來看，Wolcott (1990/1998) 在質性研究寫作乙書的序言中說：「如果你打算以質性的取向來完成你的研究，你就得準備與其他研究步驟相同的時間與精力在寫作之上」，Wolcott這一個論述是有經驗的質性研究者都能了然於心的忠告。質性研究的書寫的確是研究歷程中不能小視輕忽的一個要素。以人類學的視野來看Geertz (1986) 也認為，對於人類學家而言，不管在田野中或者已經結束田野工作，撰寫都位居中心位置而非邊陲或隱藏的面向，撰寫不能被矮化成為方法。換言之，報告的撰寫與研究的思考、分析等等是無法分離的。Miles and Huberman也說：直到我看見自己所寫的東西，我才知道自己所思所想。他們更進一步主張，透過書寫我們才能去了解行動、解說意義、以及分析、歸納。書寫是質性研究之研究歷程中主要而且費時的一項工程，它是分析與理論發現的本質 (Miles & Huberman, 1994, p.299)。類似的論述非常豐富，它們除了彰顯「書寫」這一個主題值得探究之外，也呈現了它的難度，因為表面上雖然僅談質性研究的撰寫，事實上要面對的依然是質性研究中非常豐富而龐雜的議題。惟限於篇幅，本文僅能以自身的關切為出發點，在有限的閱讀與思維中來羅織相關的議題進行討論。

Wolcott 認為把嚴肅、正規而又無趣的學術寫作，做一些潤飾、調整是件好事。惟撰寫這一件事卻很少被拿出來認真的討論，以致於當某一件研究被指認為寫得很好的時候，人們經常會懷疑只是寫的技巧很好而已嗎？甚至因為文字上的好而讓人懷疑起該研究在學術上的嚴謹性(Wolcott, 1995)。進入後現代氛圍之後，社會科學家已經注意到，相同的故事可以藉由不同的寫作方式，來成就不同的故事版本。這個強調把質性研究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寫作」這一個重要的任務之上(Bogdan & Biklen, 1998/2001, p.298)。研究的書寫是值得關懷與耕耘的一片田野，可惜的是，目前國內這片田野並不豐美，而且耕耘的人口也相當有限，無怪乎蔡敏玲(2001, p.252)在教育質性研究報告的書寫乙文說：「空谷獨處，不是可怕的事，能有回音，腳程必然更佳」。而張芬芬 (2002) 在質性研究的評鑑乙文也提到，臺灣地區的質性研究報告多半仍以科學論文的格式來撰寫。

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學界各項論文的評審規準中經常含有書寫格式乙項，即

便該項評審規準沒有顯現在的文字上，通常在進行審查時，審查者也會將書寫這個面向的表現放入考量。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的教師資格著作審查表格(乙式)的缺點乙欄中就包括了「論文寫作格式不符」這一個項目。而教育部的這一個評審規準不但適用於量化研究，也同樣適用於質性研究的升等論文之評鑑。這一個位階甚高，而且過去一手掌握高等教育機構之教師升等大權的評鑑規準，將論文寫作格式放入視野，但不知教育部制定該項規準時，所謂論文寫作格式不符指的是什麼？又是否每一位論文審查者對於該項規準都有相同的詮釋呢？此外，還有種種期刊、研討會的論文審查也都會面臨相同的問題。因此，從現實面來看，這是一個學界人士，不管審查別人的論文或自己的論文被審察，一定得碰觸的議題，因此，它值得再思與再深究，並在學術圈激盪出更豐富的論述，並以論述來媒介更有自覺、更有智慧的下一步。

二、什麼是另類書寫

另類(alternative)在中文的語境中經常意味著不同於主流、有別於傳統的作法，例如我們使用「另類評量」、「另類學校」等字眼。在英文的脈絡下「alternative」有三層意思，第一，它是不同於原有的另一種選擇；第二，相較於舊有的存在，另類是一種殺傷力、破壞性比較小，而且比較有效的一種選擇，例如另類醫療；第三，另類意味著對於既有的社會及道德標準的離棄，例如另類的生活形態、另類電影院(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1995)。而本文採用「另類書寫」這個語彙，在英文語境中比較接近第一層涵義，易言之，就是不同於傳統已有的論文書寫之選擇。

在台灣的教育社群一提到論文，最直接的聯想就是「緒論、文獻探討、方法、研究發現、結論與建議」這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格式。另類書寫在格式上打破這套制式的規格，例如以故事、戲劇、小說、詩、或以對話的方式來撰寫，甚至選擇文字以外的媒材如影像，或者只是小幅度的偏離制式論文的規範，例如彰顯主體，以第一人稱的「我」出現，而不是以貌似客觀的「第三人稱」出現；或者在章節的安排上稍微不同於制式論文，但論文的重要要素依然齊備。例如 Munhall (轉引自 Padgett, 1998/2000)歸納出大部分質性研究的報告依然含有下面四個要素：研究的目標和背景、研究方法、研究發現、結論和建議。因此，更貼近的看，質性研究報告和一般量化論文所包含的「要素」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差異可能在於排列的次序，這是「格式」上的不同，而這種重新排序後的格式，可能近似於一般量化論文，也可能風貌很不同，易言之，就格式這個面向來看，從很傳統到

很另類可以構成一個漸變的連續體(continuum)。

另外就文類(genre)來看，文類具有下列特性，第一，溝通的目的是形塑文類的首要因素，因此當溝通的目的改變則文類亦隨之改變，例如撰寫的目的是為了說服抑或單純地呈現事實，其企圖不同一定會影響文類。第二，文類是高度結構化而且依循一定傳統所進行的溝通，通常是在學術或專業社群中長期訓練的結果。第三，任何一種特定的文類對於書寫者都會形成某些限制，但也因此我們可以辨別出私人信函和商業書信的不同，可以分辨促銷信件和新聞報導的不同，這都是拜文類之賜(Bhatia, 1993)。從文類來看，所謂另類是一種與特定學術社群慣有之論述方式不同的書寫，例如傳統的教育學術論文多數是一種以第三人稱出現的議論文，對於以第一人稱現形，或非議論文面貌呈現的其它形式，例如詩、戲劇、散文等等是一種從文類的角度切入的另類。

此外，在談論書寫的時候，經常還會出現另一個用語「風格」(style)，什麼是風格呢？風格指的是使用文字來表達想法的特殊方式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1995)。在相同的文類下可以展現很不同的風格。傳統社會科學式的論文被譏評為沒有風格的書寫，但沒有風格也可以稱得上是一種風格。就書寫來看，個人以為文類(genre)是最上位、也最具影響力的一個概念，而後是風格，接著是格式。因此，所謂另類書寫可以說是格式或文類不同於傳統制式論文的書寫，也可以說是風格不同於傳統制式論文的書寫。至於量化研究出現之前，在教育的領域中很早就有諸多質性研究的書寫存在，例如史哲取向的教育論文，這些書寫的格式早已經被教育社群所接納，因此不是本文的討論範圍。

本文的討論焦點是教育質性研究的書寫，而非整個社會科學研究。因為就「書寫」這個議題而言，每一個學門與領域的情形固然會相互滲透，但仍有相當的差異，例如在人類學的領域中，Maanen 早在 1988 年就已經提出寫實的故事 (realist tales)、告解的故事(confessional tales)、和印象式的故事(impressionist tales)等三種不同的撰寫文類(Maanen, 1988)。而後兩種文類，即告解與印象式，截至目前為止對教育研究社群而言，依然是頗另類的行徑。此外，個人的敘述(personal narrative)在民族誌的寫作中，雖然被視為一種軼事，而其承載知識的工具性價值也不受重視，惟科學並未完全地置該文類於死地，個人性的敘述扮演著中介的角色，它展現在人類學權威與個人權威的張力之間，在涉入與自我隱身之際，同時也在主觀事實與客觀事實的矛盾之間。因此 Clifford and Marcus(1986)認為結合個人敘述與客觀描敘的寫法並非現代民族誌的新發明。換言之，另類與否是相對的，在不同的學術版圖上其圖像不盡相同。本文對焦的是台灣的教育社群，討論教育質性研

究報告的另類書寫，在引援相關文獻時雖然會借用其它學門的經驗，但關心的重點仍在教育的質性研究書寫。

此外，另類與否也與時間這一個因素有關，舉例來說歷史學界相當知名的黃仁宇作品「萬曆十五年」，在1991年的研討會(江政寬，2001)上仍被批評為「歷史學界的瓊瑤」、被視為小說而非歷史。但是十年後在江政寬(2001)的論述中，「萬曆十五年」乙書成了「歷史分析」這種主流之外，開創「歷史敘事」的先行者，地位丕變。由是可知，是否被視為另類要看安置在什麼時間點上，而本文所對焦的當下指的是民國九十一年臺灣的教育社群。

貳、質性研究報告之書寫的現況鳥瞰

好的書寫不僅是對於事務的揣摩，還要激發讀者的感覺 (Ezzy, 2002)

邇來如雨後春筍般的質性研究書籍中，對於報告撰寫的部分也普遍有了進一步的鬆綁，像 Neuman (1997/2000) 的 社會研究方法 乙書，在質性研究的報告撰寫中提到：他們（指質性研究者）享有更大的自由度使用文學技巧來述說一個故事，或是重述某個事件的經過。Neuman (1997/2000, p.931) 還進一步說，田野調查報告可以用第一人稱來撰寫。Padgett (1998/2000) 則說，質性研究報告的書寫沒有標準正確的形式，甚至主張質性研究者要學習小說、詩、戲劇和編舞。Bryman(2001)出版的 社會研究方法(Social research methods) 乙書提及質性研究報告時，特別強調修辭的策略，並以兩頁的篇幅來介紹後現代主義在研究撰寫上的意涵。另從撰寫的相關議題來看，第二版的 質性研究手冊(*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Denzin& Lincoln, 2000) 也有頗多的論述。中文的部分，陳向明(2002)的 社會科學質的研究，也以相當的篇幅談質性研究的撰寫。

後現代的思維進入質性研究的領域之後，書寫有了多樣、精彩而豐富的展演。像Richardson 就曾經主張以詩的方式來展現質性研究報告，因為詩這個文類開展、創造了同時呈現研究者自己與研究對象的空間，這種文類讓研究者不僅止於談論研究而且能在撰寫的歷程中有了動態性的經歷與做的感受 (Gubrium & Holstein, 1997, p.4) ¹。這個論述讓我想到紐約大學的M. Susser (轉引自 Padgett,

¹ 對於「詩」這個文類的論述，女性主義者有相當深刻的看法，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女性主義之相關論述，如 Humm, M. 在1995年出版的女性主義理論字典，pp.208-209

1998/2000) 說「擔任作者(authoring)」是不同於「撰寫(writing)」的，Padgett接著說相較於質性研究而言，量化研究的報告多半是作者而不全是寫作。此外像情緒主義者也宣稱，傳統的研究方法與理論太膚淺，根本無法掌握實際經驗的重要面向，尤其是情緒。Douglas主張，存在的核心是感受與知覺，那是我們最深層的自我，而這些面向往往無法從談話以及互動的分析來獲得。研究者必須深入人類靈魂的深處，必須仰賴開放的分享、親密、情意上的敏銳等等。而目前在科學的探索領域仍沒有適當的方法可以運用，因為情緒的探索是人文的、是存在(existential)的面向，也因此傳統的報告格式與情緒相遇會顯得捉襟見肘，詩、戲劇、內省的田野筆記乃相應紛紛出籠(Gubrium & Holstein, 1997, p.8)。再現的議題(representation²)再度被關注與解剖，真實性的表達(authentic representation)在後現代的氛圍下受到極度的挑戰與圍剿(Kridel, 1998, p.17)，「再現」被改寫為「再行動」(Gubrium & Holstein, 1997)。撰寫不只是傳統社會科學式的描述或解釋，也不僅是田野行動的延續或例子。以後現代的解構觀點來看，民族誌的撰寫是文本的召喚(evocations)、是表現(performances)、也是治療(therapy)(Webster, 1990)。

在後現代解構之前，Lofland L.早在1974年檢視了社會學領域的諸多質性研究後表示：這些研究在資料蒐集和資料使用的方式上都非常近似，然而報告卻展現了相當歧異的風格(轉引自Gubrium & Holstein, 1997, p.4)。Banister(1994)以心理學領域的質性研究為背景，在討論報告撰寫時特別強調：沒有完全正確或錯誤的方式來撰寫研究報告。如果要更精確地進行探討，則應該視使用的研究方法而定。易言之，Banister認為研究報告的展現和使用的研究方法有關聯。Miles and Huberman(1994)則進一步指出：質性研究的報告沒有一定的組織，每一份研究必須因應研究的知性(intellectual)背景與地方脈絡來雕琢出相契合的架構(p.302)。此外，Miles and Huberman也回顧了Bogdan and Biklen等七組人馬對於此一問題的見解，沒有意外地，他們都只有概略性的建議，Miles and Huberman(1994)雖然透過回顧，整理出一些質性研究的報告必須照顧到的面向，但是組織、剪裁之妙依然擁有相當大的彈性空間。此外，Miles and Huberman(1994)認為，質性研究的報告呈現可以選擇不同的聲音，它們分別是：實在主義者的聲音、告解者的聲音和印象主義的聲音。惟值得注意的是Banister(1994)等雖然認為研究報告的展現風格或形態和使用的研究方法有關聯，這個論述已經暗許了多元風格的價值，但是他們的書籍仍然只對於傳統的撰寫形式進行細步的介紹。從這個現象我

² representation 這個字在本文視脈絡或譯為「再現」，或譯為「表達」。

解讀到雙層的意義，第一：接受有程度上的不同，從觀念上的接納到實踐仍有一段遙遠的距離；第二，質性研究在撰寫上擁有較大的自由度，研究者可以視研究主題等等而改變書寫的格式、風格等等，這些變異讓撰寫形式的細步介紹成為棘手的工作，因此只做原則性的論述。

Eisner 和 Barone 提倡藝術取向的教育研究(arts-based educational research)，希望教育研究社群能夠自我鬆綁，在極度科學語言及詩和故事這兩極所構成的光譜上能夠開發出更寬闊的領土，而不要自限格局、自行窄化視野。Barone and Eisner 說「許多讀者在面對藝術取向的教育研究報告時會覺得內容很有趣，而且也確實從報告中學到了東西，但是仍不免懷疑這種報告能稱為研究嗎？」(1997, p.115) 他們在 1988 年對於藝術取向的教育研究所做之評估是：僅有少數人能夠接納這種文類模糊(genre blurring)的研究形態，這除了涉及權力、政治的面向之外，無庸置疑地，這種新的文類挑戰了人們已經習慣的規準(Barone & Eisner, 1997)，而要去挑戰行之有年的慣性不但需要充沛的能量也需要耐心的等待。

在教育領域耕耘多年的 Wolcott 擁有相當灑脫的文字風格，他有一篇用力甚深的民族誌個案研究，題目是：足夠的學校與不足的教育—一個鬼鬼祟祟的孩子之生活史。當他非常引以為傲地把這篇研究分享給一位同事時，沒有料到那位同事居然拜託 Wolcott 不要把這篇文章給研究所的新生閱讀，免得誤導學生對於質性研究的認識。因為 Wolcott 的同事不認為足夠的學校與不足的教育可以稱得上是研究，道理在於這篇報告沒有問題的陳述、沒有相關文獻的探討、沒有研究假設、沒有清楚界定的研究程序、更缺乏清楚的研究發現。Wolcott 接著說，經過這個事件，我才完全地清楚我們對於教育研究的看法是如此的僵化，這是一個相當值得正視與探討的議題 (Wolcott, 1997, p.368)。在國內張芬芬(2002)也觀察到質性研究由科學化的論文格式到文學化、生活化的表達風格是目前國內比較弱的一環。此外，她提到，論文評鑑者「看不慣」情緒性的語詞表達亦時有所聞，因此，國內學界對於具有文學風格之質性研究報告的接受度仍待觀察。蔡敏玲(2001, p.235)則以切身經驗提及自己的研究被評為「論文寫作格式不符」，雖然在申覆後情況已經逆轉。但是從這些現象可以看到教育學術社群對於「另類書寫」的實際接納情形和看似繽紛而多元的質性研究書寫之論述仍有一段遙遠的距離。

我同意 Fine 等(2000)的觀察「學術社群的確在改變之中，但是改變的步調非常緩慢」，如果用典範轉移的視框來看待這件事其實是不難理解的。無疑地典範轉移之際必然有痛苦，同時典範的轉移也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完成的，猶如進入廿一世紀的我們，天文常識早已經進步到「地球由西向東繞太陽旋轉」的太陽中心

觀，但是我們的日常語彙卻仍然停留在「太陽從東邊昇上來」的地球中心觀。在典範的轉移間持續的努力，不斷的對話與說服是不可少的。如果你不同意典範轉移的觀點，而以比較後現代的情懷主張多元典範共存(Lincoln & Denzin, 2000)，那麼對於新來後到的典範亦有進一步提高其曝光率的必要。因此，下一節我將從四個角度，再次論述教育質性研究另類書寫的合理性。

參、解構制式的學術研究撰寫

傳統學術論文的寫作有其特色與長處，其論文的格式與量化研究之演繹邏輯是相互契合的，而且行之有年，因此是一套對讀者而言認知負荷比較低的書寫格式。但是研究背後有不同的理論基礎，益之以慶祝多元的後現代氛圍，傳統學術論文的寫作不能也不應該再霸權地宣稱自己是唯一合理的書寫方式。這一節我試圖從三個角度來鬆動制式研究書寫的霸權地位，第一是從中間層級的書寫功能之面向來考量，書寫具有「再現」的功能、書寫具有回身形塑研究者及研究社群的功能，書寫的形式能否展現研究本身的認識論與方法論的基礎是第三個次面向，此外另類書寫的跨界傾向具有誘發創新能量的功能，因此在功能面向有四個次面向要加以討論。接著進入較微觀的「語言」面向來解構制式的書寫，最後則拉抬回到巨觀面向，即質性研究所在的脈絡 - 一個充斥著權力關係的學術社群 - 來解構制式書寫的霸權地位。

一、從功能的角度來思考

(一)另類書寫能精緻並活化其「再現」的功能

不可因為拘泥學術寫作的限制，而抹煞了人們生活的原創與活力。

(Wolcott, 1990/1998)

H. Wolcott 在質性研究寫作乙書的序言中說：「當我們從事描述性寫作時，我們要記得，我們所寫下的是一般人的日常生活點滴，寫作必須反映他們生活的原味與原貌，不可因拘泥學術寫作的限制，而抹煞了人們生活的原創與活力」(Wolcott, 1990/1998)。諸多民族誌研究者常悼念其報告的撰寫無法囊括很多重要的研究發現(含自我的知識)，或者嚴重的貧瘠了精采的研究所得(Pratt, 1986, p.33)。Pratt(1986)在文章中自問，為什麼有趣的人類學家在田野中進行著精采工

作，而卻寫出這麼無聊的報告呢？我的答案是：因為他們穿上了制式研究報告的緊身衣。誠如 Brady (轉引自 Fisher, Kopelman, & Schneider, 1994) 所說：「假如你所擁有的工具只有榔頭，那麼不久之後所有的事物看起來都像釘子一般」。最近在人類學的領域中，我終於看到 Barley(1983/2001)以另類的方式，把田野中的喜怒哀樂傳神地加以描摩，Stock 為該書(天真的人類學家)所寫的推薦序以「人類學、文學以及遊記」為標題。回首 Wolcott 的忠告，我看到 Barley 因為跳脫了學術寫作的限制，因而能傳神地展現人類生活中的原創與活力。

Wolcott 以相當現代性的情懷，用「再現」的框架，來檢視主流學術研究的撰寫時，它的疏陋與不足都已經無可遁形。如果再以後現代的框架來觀照，則其有限性也就更加清楚了。在現代主義的氛圍下，再次去表徵(亦即再現)某些事情是可能的，我們可以用一個事物，例如概念、人、地方或時間去替代另一個事物，而不會有內容的流失或意象的扭曲等問題，而後現代主義者則認為表徵是不可能的(Rosenau, 1990)，既然現實的再現不可求，那麼傳統學術論文要求使用客觀、理性的文字來進行書寫，以便能真實地反映外在現實(reality)的說辭，也就不攻自破了。

簡言之，如果你依然相信「外在現實的再現」是可能的，那麼多元的撰寫方能為「再現」提供更好的服務，讓研究者擁有更多的工具，維妙維肖地來勾勒「外在的現實」。如果你認為「再現」是不可能的，那麼多元的撰寫將提供更豐富的視角來建構現實。簡言之，在多元書寫被接納的基礎上，另類書寫亦獲得了存在的合理性。

(二)另類書寫的回浪效應能拓展研究者的思維及研究的光譜

從教育探究的內涵來看，誠如 Barone and Eisner (1997) 所說，在「科學」和「藝術」這兩極所構成的光譜中，教育研究所運用開發的腹地實在太有限了。通常一提到教育研究很自然的就會想到社會科學式的探究，在教育研究極待拓展的情勢下，鼓勵多元書寫能夠創造一個比較有利的外在結構來引發多元的教育研究，因為書寫、表達的方式和研究本身是無可避免地糾結在一起的(Gergen & Gergen, 2000)，即便把書寫矮化為一種工具，工具也會回身影響本質，因此多元書寫有其存在的理據，而另類書寫當然也從中獲得存在的合理性。

心理學家 Bruner 認為書寫是一種「外部化」(externalization) 的行為，它有助於我們把混沌未明的理清楚(Bruner, 1996/1998)，或者更直接的說，寫作本身就是一種思考的形式(Wolcott, 1990)，無疑地傳統學術論文的呈現方式只是思考形式的一部分，以其思維形式來壓抑其它種種不同的可能形式，是一種不智的作法，這

種不智的作為可能枯竭、貧瘠了學術社群的創發與多元豐富。Bruner(1996)亦主張人類擁有兩種不同而互補的方式來整理、與面對我們的經驗，其一是傳統邏輯科學的方法，而另外一種則是經常被我們忽略與壓抑的敘事模式。前者是傳統社會科學論文所強調的認知方式，而被忽略與壓抑的敘事模式則是質性研究者的關懷（Schwandt, 1997, p.99）。簡言之，多元的書寫有助於研究者使用多元的管道來拓展其自身的思維，另藉著多元書寫的引發亦有助於豐富教育研究的類別。

(三)另類書寫的形式較易與不同於演繹假設的教育研究接榫

Gillham (2000)認為傳統研究報告的撰寫規格呈現了演繹以及假設考驗的漂亮邏輯，同時也容易理解其知性的訴求。但是其創造性的過程卻經常遺失在研究報告之外。事實上，讀者經常得借助於科學家的自傳，才得以了解其科學發現真正發生的歷程。這種化約式的報告撰寫曾經被批判為作假，Gillham則比較和緩地說，並非科學報告不真實，而是它對於知識獲得歷程的鋪陳不足。

同樣把焦點放在認識論與方法論之上，Parker (1997)認為，當研究重心從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轉移到個別化(particularization)之後，就必須有不同的書寫形式來因應，過去那套「從文獻探討、方法、資料蒐集到結論」的形式也許適用於實証科學的典範，但不能一體適用於所有研究。形式和內容二者是無法斷然分離的，撰寫的方式會反映背後的理論基礎，例如持參與的世界觀者通常會強調在報告中出現「反省性」(reflexivity)，因此「我」這個字眼出現的機率就很高。誠如Ezzy (2002)所說：在質性研究中當研究者被視為研究工具，並且是研究歷程的重要成分，卻在書寫時刻意壓制「我」，而以第三人稱出現，這對研究的主體而言是一種不公平的對待，從這個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撰寫無法和背後的理論預設分開，甚至可以進一步說，書寫的本身就是一種理論(Webster, 1990)。

從理論的基礎來看，質性研究的撰寫可以粗分為兩個陣營，分別是：民族誌研究的實在論者(ethnographic realists)和文化現象學者(cultural phenomenologist)。民族誌研究的實在論者依然肯定有一個外在於研究者的「現實」(reality)等著研究者去發現，然後「逼真」地加以呈現。因此，傳統社會科學式的撰寫方式仍能適用，但文化現象學者的預設與制式的撰寫格式則顯得格格不入。如果你同意形式和內涵必須協調一致，則撰寫的形式勢必要多元才能對應實質內涵及理論預設極其異質的教育研究。如果在形式和內涵的對應上，你的立場不是這麼嚴格，那麼該如何來辯護另類書寫的合理性呢？從質性研究的作品中我們觀察到：軟心腸的研究取向可能採用硬心腸的方式來表達，反之亦然（張芬芬，2002，頁25）。在這種情形下，也許Richardson的論述幫得上忙，他說：藉著不同的撰寫方式可以

發現主題的不同面向，也可以彰顯研究者和探究主題的新關係(Richardson, 2000, p.923)。如果你同意書寫本身就是一種探究，那麼讓多元的探究方式同時存在應該是值得鼓勵的一個方向。

(四)另類書寫的跨界傾向具有誘發創新能量的功能

創造不在於看到了什麼，而是在於怎樣看(滕守堯, 1995)

對已有的材料重新排列一番就已經是新的了(滕守堯, 1995)

質性研究發展至第六代(the sixth moment)以後，其書寫的特色已經跨越了真實與虛構，諸多實驗性的民族誌書寫例如詩歌、故事、戲劇等等已經進入視野(Denzin, 1997, p.126)，Denzin 並進一步地解構界線與疆界，把文學/非文學、虛構/非虛構等統統視為社會建構，而全部都可以用敘事(narrative)來看待它們，它們都是人類用於了解各種情境的方法。

另類的質性研究書寫經常具有跨界的傾向，例如跨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甚至涉足藝術領域。這種具有跨界性質的書寫，在邊界展現深具創造風華的新文類。跨界是一個重要的機制，例如現代生物學和符號學相互合作，得到一種全新的科學發現：生命也許是起源於不同物種之間的碰撞、拼接和對話，而不全是像達爾文說的那樣，起源於物種之間的相互競爭和適者生存；新物種的生成也許是一種突現。因此創造就是將那些已有的但是又相互分離的要素、事物、概念、事實、知覺框架、聯想背景等結合、合併和重新「洗牌」，在一個作為「邊緣地帶」的頭腦中交叉生殖或自我生殖了(滕守堯, 1995)。

跨越文學、藝術與社會科學的另類撰寫方式，本身除了是研究之外還散發著誘人的文學氣息與媚力十足的藝術情調；研究作品常有的乾澀與無趣被文學和藝術豐富了，相對的文學與藝術的形式也因為研究的實質內涵而更加富饒。這是對話所締造的精彩，也是後現代情懷下所謂的「邊緣領域」，經由跨界與異質交合而展現的邊緣存在應該被祝福而不是打壓，應該受到滋養，繼續以拼接、溝通對話的情懷去鼓勵創新。江政寬(2001)站在歷史的土壤上，引用懷特的主張：在歷史學界藝術性與文學性較高的論述，不但沒有削減其本身作為歷史的地位，反而使其作品免遭最終的否定，這是跨界所締造的優勢，最佳的例子應屬太史公司馬遷，司馬遷是一位史家，不以文學創作為其書寫的目的，他寫史記留下中國史學的偉大著作，司馬遷不自認為是文學家，卻不能排拒後人，而後人也不能無視他經由史記的創作所展現的文學造詣。劉大杰說史記是「文學的歷史，也是歷史的文學。它是歷史與文學完整統一的典範」。然而無可否認的是，跨界者在特定的

時空下，也有一定的困境。回到歷史學界上文曾提及的「萬曆十五年」乙書，作者黃仁宇在 1976 年欲出版此書時，就同時遭到商業性及學術性出版社的質疑（江政寬，2001）。這是跨界可能的困境之一，而此一困境則與權力脈絡息息相關，有關權力面向的解構將在第三部進行討論。在跨界之際面臨過困頓的還包括 Feigenbaum（費根堡），他的研究界於數學和物理之間一道被遺忘的中間地帶，在他的研究被接納之前，長達兩年之久作品一再遭受學術期刊的白眼（Gleick, 1991/1995），此外，有不少對「混沌」有興趣的研究者也都曾經遭逢相同的困頓。

總之，從功能的數個次面向來看，它們都共同指向一個建議，那就是「多元的教育質性研究書寫應該被鼓勵」，這個建議讓另類書寫獲得了滋養與合理性的基礎，這幾個面向分別是：

1. 多元書寫有助於研究者思考的拓展與教育研究光譜的延展，因此另類書寫具有合理性。
2. 教育研究本身具有不同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因此多元書寫是合理的訴求，當然另類書寫也具有合理性。
3. 從「再現」這個角度來看應鼓勵多元書寫，因此另類書寫具有合理性。
4. 另類書寫的跨界傾向有助於誘發創造，為學界注入新的活力，因此是應該得到祝福而非打壓的一種努力。

二、從語言的角度來思考

不是我在說話，而是話在說我（滕守堯，1995）

語言並不是反映自然，而是創造我們所知道的自然

（Harlene Anderson 轉引自 Close, 2002, p.13）

曾經榮獲 1906 年諾貝爾醫學獎的西班牙科學家 Santiago Ramon y Cajal (1852/1934) 曾經建議年輕的科學家：在寫作時一定要真實、冷靜、簡單而且不要太多感情。在純粹科學文章裡，不適當的強調、誇張或是華麗的修飾，都是應該盡量避免的，不然的話，我們就會喪失了學者的信心，因為學者會把這些作者看做是夢想家或者是詩人，而沒有能力作精細的研究，也沒有能力對問題做冷靜的邏輯分析。因此科學家寫作的時候，一定要努力反映客觀的真實，就像是一面鏡子可以寧靜誠實地反映現實……一定要拋棄有風格作家的那種虛矯態度。Santiago Ramon y Cajal 主張不要對語言、文字放入太多的關懷，這種把語言、文字邊陲化、工具化的論述，強調客觀的真、報告的撰寫不能以文害意等等，都是在現代性的視野下，所看到的語言風貌。

在現代性的視野下，語言符號和真實世界中的物體、事件有著一對一的對應關係，在外面有個真實的世界，我們可以藉著語言來了解它。語言可以毫不含糊地代表外在的現實（周慶華，1997；Freeman & Comb, 2000）。就是這種對待語言的信念，讓 Santiago Ramon y Cajal（1897/2000）說：「科學家寫作的時候，一定要努力反映客觀的真實，就像是一面鏡子可以寧靜誠實地反映現實」。他又說：「不要對語言、文字放入太多的關懷」（同上，頁 234），建基在同樣的信念之上，美國 APA 出版手冊第四版說：「小心地使用華美的描述」（APA, 1994/1996, p.56）。

在後現代的視野下，眾人唯一能認識的世界，是以語言分享的世界。而語言是一種互動的過程，並不是被動地接受既存的真理。誠如 Rorty 所說：「世界並不會說話，只有我們會說話」（轉引自 Freeman & Comb, 2000, p.64）。語言告訴我們該如何去看世界，也告訴我們看到的是什麼。語言在後現代的轉折下有了很不同的圖像，能指與所指斷裂（周慶華，1997）。Anderson（轉引自 Close, 2002, p.13）說：「語言並不是反映自然，而是創造我們所知的自然」，每當我們說話的時候，就在創造一個現實，語言並不是被動的。Derrida 說「不是我在說話，而是話在說我」，把主體的存在歸結為語言，這種語言的轉折，似乎是後現代主義者的一個共識（滕守堯，1995）。Gergen and Gergen（2000）說：過去十年對於質性研究社群影響最深遠的是，有關於語言性質之討論，以及這種轉折後的語言對於語言所欲描繪的世界之關聯（p.1026）。歷經這種語言的轉折後，科學方法的認識論基礎被消融了，Denzin and Lincoln（轉引自 Gergen & Gergen, 2000, p.1026）因此說，我們有了效度危機。後現代主義者一般而言均排斥現代主義者所謂的再現(representation)，尤其是具懷疑傾向之後現代主義者(skeptical post-modernists)，他們認為所謂真實再現在認知上，方法上以及本質上均是一種詐欺(Rosenau, 1992, p.22)。所有的描敘都是修辭的，即便科學式的描述亦無法自外於修辭的王國(Gubrium & Holstein, 1997, p.91)。在後現代的視野下，社會學的目的不在於客觀地了解一個對象，而是一種鮮明、活靈活現的敘述，在這種敘事性描述的脈絡之下，模糊、主觀既不是病態亦非偏離常軌的事(Rosenau, 1990, p.40)。主觀意謂著「個別性以及自我的覺知，他們是主體的一種條件」(Rosenau, 1990, p.42)。

「再現的危機」在人類學的領域中也引起了相當大的騷動，人類學的領域對於正確地描述異文化，繼而產生理論這一個基本研究基調依賴甚深，在再現危機的挑戰下，如何安身立命呢？部分學者(如 Tyler)以「喚起」(evoking)來替代「再現」，因為喚起不再受制於外在的客體、事實、描敘、概化、實驗、現實等等。但也並非所有的人類學家都滿意於這種謙卑的任務，因為這種角色的自我界定，

在無形中挫傷了人類學家的專業權威。在社會學的領域中再現危機也使得「理論建構」無法安身，社會學的研究成為一種說故事的行為，它成為寓言或文學而不再是科學(Rosenau, 1990, p.107)。從報告撰寫的角度來看，質性研究者如何回應呢？依據 Gubrium and Holstein (1997, p.92)的論述，至少有四種迎應的方式：第一種，懷疑取向的後現代主義者認為，真理(truth)必然是相對的，有愈來愈多的主流社會科學研究者承認，沒有所謂不經過污染的真理(unadulterated truth)) (Lincoln & Denzin, 2000, p.1051)，因此，相較於其它的敘事，社會科學的報告並未擁有特別的優勢，也不該享有特別的榮寵對待。這是一種趨向虛無主義的態度，例如 J.Schneider 就是這個陣營的代表；相反的，第二種樂觀的人則以為質性研究者所仰賴的工具也同樣是其它所有論述所使用的工具，因此質性研究者無須過度關切再現的議題，而放棄了描敘社會世界以及生活經驗的任務，像 P. Atkinson 就是這種樂觀主義者。

從撰寫研究報告的視角來看，在這兩個陣營之外，勇敢而激進地面對再現困境者是值得喝采的，有的嘗試以各種另類的表達方式來完成傳統實徵性的描述任務，這種文本形式的實驗展現了解決困境的誠意與勇氣。此外，藉諸實驗的歷程，讀者有機會看清楚文本權威(textual authority)以何種方式在進行運作。面對後現代的批判，第四種激進的回應是Marcus所謂的雜亂文本(messy texts)，Richardson 以詩的方式來呈現一位未婚媽媽的生活經驗是雜亂文本的實例之一。Richardson擔心單純地敘述那位未婚媽媽May的故事無法活生生的展現當事人的生活世界，例如一位社會學者在閱讀的時候可能會把May的故事當成是資料，然後試著去蒐尋背景背項來解釋May所言、所行，這種閱讀鉗入了社會學的色彩，但是卻把May她自己的生命版本給遺失了。所以Richardson她把 36 頁的訪談逐字稿寫成 3 頁的詩作，她主張詩是一種比較有利於了解May自身觀點的文類，同時在寫詩的過程中Richardson看到自己想要寫的欲望，因此Van Maanen's所謂「告解式的故事」的色彩出現在其中，也可以說Richardson在其中的自我顯露是一種「個人社會學」(personal sociology)。但Richardson 的企圖又不僅止於自我經驗的深入探索，而是一種自我情緒與其研究的對象May 之回應的混合體³(Gubrium & Holstein, 1997, p.94)。

後現代的氛圍下，在諮商的世界裡，我看到諮商師誘導個案以新的語言、新

³對 Richardson 所寫雜亂文本的例子有興趣的讀者可逕行參考下面書籍

Richardson, R. (1992). The consequences of poetic representation. In C. Ellis & M. Flaherty (Eds.),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pp.125-137). Thousand Oaks, CA: Sage.

的故事來描述自己的經驗，藉此讓生命產生更多新的可能 (Close, 2002, p.13)。借著諮商的視野，我看到後現代性消解了「自我」，或者說自我的認定可以是多重的、流變的，借用女性主義的用語，自我是「處於過程中的主體」(Weedon, 1987/1994)。當撰寫主體之確定性都不可求，那麼對於真實表徵的冀望也就無異於緣木求魚了。在歷史研究中，Jenkins(1991/1996, p.64)說：「自來就沒有任何歷史學家的記載，能與過去確切的對應」，他又說：「歷史是一種移動的、有問題的論述」(Jenkins, 1991, p.87)，於是史實的確定性被鬆動了，真與假開始模糊了，「假作真時真亦假」的文學、美學情懷於是滲透進了冰冷、理性的社會科學領域。

從語言的角度切入，依然得面對「現代性」和「後現代」這一個難解的纏鬥。在這個戰鬥尚未有解之前，以使用者的立場而言，目前我個人的態度是：「在商家的競爭中，消費者應該是最大的贏家」。換言之，研究者可以視研究的基調而在百家爭鳴的各種可能性中選擇適切的書寫。換言之，你可以不買後現代鋪子中的語言，而依然癡情地守候著現代性視野下的語言，你可以不忘情於實証主義的老字號，鍾情於實在主義者的聲音(realist)，也可以採用傳統的論文來呈現研究，這個選擇應該受到敬重。我在借用後現代的語言視角來為另類書寫找尋生存空間的時候，並沒有做出後現代的語言觀和現代的語言觀孰優孰劣的價值判斷，只是想指出另一個不能忽略的視角，因此對於做出不同選擇的質性研究者，例如採用告解者的聲音或印象主義者的聲音等等，這種比較另類的書寫方式也應該獲得相同的尊敬，以及合理的生存空間。誠如 Lather (轉引自 Ezzy, 2002, pp.149-150) 所說：語言的轉折或再現的危機並不意味著再現從此成為一項不可能的任務，而只是提醒我們，不要再喬裝有任何一種表達方式是唯一真實、正確、而權威的撰寫方式。既然沒有任何一種表達是唯一正確的撰寫方式，那麼教育質性研究另類書寫的合理性也就不辯自明了。

三、從權力的角度進行思考

知識與權力是有關聯的，真理賴「有權力」的人使它成為真理(Jenkins, 1991/1996, p.98)，這是相當具有 Foucault 色彩的觀點，權力與知識是共生體，知識植根在權力關係中 (徐崇溫, 1986)。因此，權力在學術的版圖上顯影也就不足為奇了，Ramon y Cajal Santiago (1852-1934)早在 1897 年告誡年輕的科學家，科學發現之重要與否，是人所決定的，沒有絕對客觀的標準，所以他建議不要用西班牙文發表論文，以免被主要國家的科學家所忽略 (Ramon, 2000, p.17)。這一個幾乎百年以前的建議，迄今依然有效。此外，上文曾提及 Ramon y Cajal Santiago

還建議年輕的科學家，在寫作時一定要真實、冷靜、簡單而且不要太多感情。在純粹科學文章裡，不適當的強調、誇張或是華麗的修飾，都應該盡量避免，不然的話，會喪失了學者對我們的信心，因為學者會把這些作者看做是夢想家或者是詩人，而沒有能力作精細的研究（同上，2000, p.232）。從權力關係的視角切入，這些話讓我看見了年輕的科學探索者必須平實、精準地撰寫科學研究報告，為的是從科學社群的守門人—學者—那裏得到其研究報告的合法性（legitimacy）。一旦媳婦熬成婆，但因身處邊陲國家，只好選擇對自己來講可能比較不擅長的英語來進行書寫，權力對學術世界之影響不可謂不大。

Richardson（轉引自 Ezzy, 2002, p.152）觀察美國學界之質性研究書寫之後也提到：許多權高位重者反對實驗性的質性研究書寫，這使得學術界的一些新手在獲取肯定以及進行革新的、實驗性的書寫之間面臨了兩難。Richardson 避重就輕地說：「這並不意謂著採用革新的書寫方式是不可能的，而是研究者自身要仔細而謹慎地權衡」（轉引自 Ezzy, 2002, p.153）。我個人以為更徹底的做法是：豐富質性研究書寫的論述，以論述為筏，把學術界引渡到一個更開放、更合理、更公義的權力結構上。誠如 Johnson（1997/2001, p.13）所說：「我們總是在一個比我們自身更廣大一點的世界參與著社會生活，如果我們要瞭解社會生活，以及社會生活對人們的影響，我們就必須了解那一個大一點的世界是什麼，以及我們如何在其中參與」。接著 Johnson 的論述，那麼要改變個體的處境，除了自我調整，當然也不能置社會結構面於不顧。

南方朔在學術界的語言之繭乙文也提到：學術世界跟任何社會世界一樣，是一個爭奪學術世界真理的鬥爭場所。圍繞著學術界這個權力場有各式各樣的爭奪和排他。而學術界的排他經常假借另一種面目而出現，最常見的就是「他的著作不合學術規格」，或「他寫的不是學術著作」。南方朔進一步批判，在這種委婉的言辭裡隱藏著排他的暴力（南方朔，2000, pp.28-29）。如果學術界要走出這個語言之繭，不再以行規的修辭學來排他，不再「自我合理化」、「自我再生產」，那麼正視「權力」，進而檢視其合理性是不可少的一項努力。

從權力的視角解剖質性研究的書寫，必然會遭逢的問題之一是：質性研究該如何評鑑？對於這一個問題，質性研究社群截至目前為止並沒有共識產生（Bogdan & Biklen, 1998/2001）。質性研究是一個傘狀的複雜概念，包含在質性研究之下的次概念不但非常的豐富、龐雜而且有的取向之間有相當大的不同存在，例如紮根理論與敘事性研究就有相當大的歧異存在。縮小範圍僅對焦於民族誌研究，則批判取向的民族誌與後現代的民族誌也頗為不同。因此，用質性研究這一個含混而

籠統的概念做為標第物來討論其評鑑規準，或進一步僅談評鑑規準中有關書寫的評鑑，當然都無法避免眾說紛云。

除了眾聲喧嘩之外，諸多質性研究者重要的興趣之一是，類形的找尋與意義的追尋，對於質性研究的評鑑這一個議題，從相關文獻（如 Hammersley, 1992）的檢視也可以歸納得出三種不同的立場，它們分別是：

1. 質性研究是科學研究的一種，因此適用於量化研究的評鑑規準當然也可以一體適用於質性研究的評鑑。

2. 適合於評鑑質性研究的規準與適用於量化研究的評鑑規準不同。持該立場的人在同中仍有小異存在，例如有的主張質性研究比較接近於文學和藝術，因此評鑑的規準是趨近於美學的；而有的則視質性研究是一種科學研究，唯它是一種更適合於探索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法。

3. 以質性研究的特性來看，不適合使用一套評鑑規準來壓制斷傷它。

如果你同意在人文社會科學的領域中沒有所謂的阿基米德點，高高在上遠離一切紅塵、世俗的上帝之眼(God's eye view)也是凡人不可得的期盼，那麼就得以更謙卑的態度來面對人類的有限與看待事情的局部性。看清楚所有評鑑規準的背後都有價值的預設，在為質性研究的評鑑規準做初步後設評鑑的當下，除了聽到很不同的聲音，看到多元的圖像，在混亂與紛云中我的學習是 - 鬆動量化研究的評鑑規準，讓研究評鑑的規準能夠以更寬廣的視角、更具彈性地回應不同類別的研究，這應該是值得努力的方向，而這個方向當然也適合於「報告書寫」這一個範圍比較小，但包涵於其中的議題。

借用黑人女性學者 Delpit 的論述，權力文化的確存在，而它反映了有權力的人他們所擁有的文化，假如你被明確地告知這一套權力文化的運作規則，那麼你要獲得權力也將容易得多（Delpit, 1997, p.583）。癥結是：知識份子似乎不應該僅以權力的獲得為滿足，而應該進一步去檢視這一套權力文化的規則運作是否合理？Delpit 說權力文化反映有權力的人所擁有的文化，因此，要檢視權力文化的規則就得反省有權力的人所擁有的文化？那麼誰是有權力的人呢？Delpit 進一步說：有權力的人往往不容易覺察，或不願意去承認權力的存在，而不具權力的人則比較容易覺察到它的存在。以台灣目前學術社群所採同儕評審的制度來看，學界的每一分子都是擁有權力的人，如果我們不滿意目前存在的這一套權力文化的遊戲規則，則有必要做反求諸己的功夫，然後以論述來形塑更合理的權力網絡。此外，從台灣教育學術社群的成員來看，絕大多數在過去的養成階段並無緣遭逢質性研究，因此需要時間與耐心來牽成也是極其自然的一件事。

肆、代結語 - 我們需要一個學術上的大地震

Handy 說：「也許我們需要一個大地震，來提醒我們不要視任何事情為理所當然，即便是我們所站立的土地，也不是理所當然的」(Handy, 1996, p.199)。權力關係固然存在於社會之中，但並不意謂著已經建立的就是必然的、就是合理的。Freeman 和 Combs 在敘事治療乙書曾經提到一個有趣而又發人深省的故事如下：

「想像在某一個生態浩劫後，有兩個倖存者一起組成新的社會，他們來自完全不同的文化，這一男一女的語言不同、信仰不同、對如何分工的想法也不同，該在什麼地方工作、玩耍、進行共同儀式、各自沈思的看法也不一樣，可是只要他們想繼續發展出某種文化，就必須在這些活動中合作，如果他們這麼做，就會出現一些經過協議的習性和特徵…而且他們必然會發展出共通的語言。在這個新興的社會中，這兩個創始者間發展出的習性和特徵會保持含糊、容易改變、甚至不怎麼當真的性質…他們會一直記得我們是怎麼決定這件事的…。對創始者的子女來說，『我們是怎麼決定…』會變成『我們的長輩是怎麼做的』，到了第三代時可能就變成『這件事應該怎麼做』…到了第四代時就會變成『這個世界就是這麼回事，這就是現實』。如伯格和路克曼所說『一個制度化的世界…會被當成客觀的現實。』」(Freeman & Combs, 2000, pp.56-57)。

這一個假想的故事很貼切地說明了制度化的過程，同時也提醒我們不要視眼前的一切為理所當然。論文、研究報告的格式或特定的語言，本來都只是知識生產者將其知識，亦即研究結果，加以呈現的一種約定俗成。後人不察竟形成壓迫與限制的來源（陳惠邦，1998，頁 268）。Handy 生活在沒有地震的英國，可以雲淡風輕的說：「我們需要一個大地震，來提醒我們不要視現況為理所當然」。生活在台灣，飽受地震之苦的我們，如果在艱難的與地震遭逢之後，居然沒有鍛鍊出「不要視任何事情為理所當然」的智慧，那麼只好忍受愚昧之苦或期待另一次慘痛的地震來震醒安住於慣性中的僵化思維。固然我們不宜把傳統科學論文的撰寫格式視為理所當然；在另一方面，後現代的流動性極易展現中央與邊陲的易位與騷動，過去位居中央的可能邊陲化。有朝一日當質性研究之另類書寫由邊陲易位而入主中央的時候，亦期盼質性研究社群不要視這種暫時的現象為理所當

然，否則另一次的地震將在不遠處招手。此外，我想強調的是，主張質性研究的另類書寫應該擁有發聲的空間，為質性研究另類書寫之合理性而發聲並不意味著另類的質性研究書寫就一定是好的作品，它依然得面對學術社群的檢核、評鑑或鑑賞，唯這是另一個棘手的議題，也是另一個極待質性研究社群共同思考的難題，但非本文之篇幅所能處理，唯衷心期盼所有的研究都能夠在一個更開放的社群，更合理、更公義的權力結構下發榮滋長。

誌 謝

*這個研究是一段艱辛的跋涉，所以本文也是難產下的成果，雖然已經懷胎三年，但是在沉重教學負擔的擠壓下沒有胎死腹中已是難得。這個作品依然不夠成熟，但一路上學術界友人的扶持與協助功不可沒。感謝國北師初教系邀請我在系上進行分享，讓我對這個主題有了輪廓的勾勒。徐宗國教授請我和台北大學社會系的老師們分享，給了我跨界對話的機會；市立師院盧美貴教授的邀約，讓我在面對質性研究向來深受重視的幼教界之前，再做一次的整理與反省。國北師國教所曾所長錦達邀請我參與質性研究評鑑座談，也丰富了我思考問題的角度。他們都是這篇作品的助產士。另個人談話、請益中國北師鍾聖校教授犀利的分析，項必蒂教授的溫暖支持都給予我相當多的啟發與能量。這一些都是激發我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的動力，感謝這一切的因緣。

*衷心感謝國北師心輔系吳毓瑩教授在百忙中撥空看完初稿，並給予豐富而非常有價值的修改意見，特此誌謝。

*感謝匿名的審查委員們提供具有建設性而且溫暖的建議，從中我看到知識份子的誠懇與敬事，懇切地致上萬分的謝意，對於相關建議已盡量在本文做回應，礙於篇幅與本文之討論焦點，其餘未能納進本文者將另文書寫。

*感謝教務處呂錦玲小姐在文章編排上提供很多的協助，對於粗心的我有非常多的幫忙，特別感謝她的細心。

參考文獻

- 江政寬(2001)。歷史、虛構與敘事論述。載於盧建榮主編，*文化與權力 - 台灣新文化史*(頁 207-236)。臺北：麥田。
- 南方朔(2000)。語言是我們的海洋。臺北：大田。
- 高敬文(1996)。質化研究方法論。台北：師大書苑。
- 徐崇溫(1994)。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臺北：結構群文化。
- 陳惠邦(1998)。教育行動研究。台北：師大。
- 陳向明(2002)。社會科學質的研究。台北：五南。
- 張芬芬(2002)。質性研究的評鑑規準：各派主張與發展趨勢。*初等教育學刊*，12，301-351
- 蔡敏玲(2001)。教育質性研究報告的書寫。*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學報*，14，233-260。
- 滕守堯(1995)。對話理論。台北：揚智。
- APA(1996)。美國心理協會出版手冊(第四版)(王明傑，陳玉玲編譯)。台北：雙葉書廊。(原著 1994 年出版)
- Barley, N. (2001). 天真的人類學家 - 小泥屋筆記 (何穎怡譯)。台北：商周。(原著 1983 年出版)
- Bhatia, V. K. (1993). *Analysing genre: Language use in professional settings*. London: Longman.
- Bogdan & Biklen (2001). 質性教育研究 - 理論與方法 (李奉儒等譯)。嘉義：濤石。(原著 1998 年出版)
- Bryman, A. (2001).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lifford, J. (1986). Introduction: Partial truths. In J. Clifford & G.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lose, H. T. (2002). 故事與心理治療 (劉小菁譯)。台北：張老師文化。(原著出版年代不詳)
- Delpit, L. D. (1997). The silenced dialogue: Power and pedagogy in educating other people's children. In A.H. Halsey, H. Lauder, P. Brown, & A. S. Wells (Eds.), *Education-Culture, economy,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zzy, D. (2002). *Qualitative analysis: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London: Routledge.
- Fisher, R., Kopelmam, E., & Schneider, A. K. (1994). *Beyond machiavelli*.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Fine, M., Weis, L., Weseen, S. & Wong, L. (2000). For whom?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Inc.

- Freeman, J., & Combs, G. (2000). **敘事治療-解構並重寫生命的故事** (易之新譯)。台北：張老師。(原著出版年代不詳)
- Gergen, M. M., & Gergen, K. J. (2000). Qualitative inquiry:Tens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1025-1046).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 Gleick, J. (1995). **混沌 - 不測風雲的背後** (林和譯)。台北：天下文化(原著 1987 年出版)
- Gubrium, J. F., & Holstein, J. A. (1997). *The new language of qualitative meth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ndy, C. (1996). *Beyond certainty*. London: Arrow Books.
- Humm, M. (1995). *The dictionary of feminist theory (2nd ed.)*. New York: Prentice Hall.
- Huston, S. (2000). **超越後現代心靈**(梁永安譯)。台北：立緒。(原著 1984 年出版)
- Jenkins, K. (1996). **歷史的再思考**(賈士蘅譯)。臺北：麥田。(原著 1991 年出版)
- Johnson, A. G. (2001). **見樹又見林** (成令方/林鶴玲/吳嘉苓譯)。台北：群學。(原著 1997 年出版)
- Kridel, C. (1998). *Writing educational biography*. New York: Arland Publishing
- Lincoln, Y. S. & Denzin, N. K. (2000). The seventh moment: Out of past.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1047-1065).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 Maanen, J. V. (1988). *Tales of the field-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iles, M. B., & Huberman, A. M. (199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2nd ed.)*. Thousand Oaks: SAGE.
- Merriam, S. B. (1988). *Case study research in educ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 Neumam, W. L. (2000). **社會研究方法 - 質化與量化取向** (朱柔若譯)。台北：揚智。(原著 1997 年出版)
- Parker, S. (1997). *Reflective teaching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Padgett, D. K. (2000). 撰寫質化研究報告 (張英陣校閱)。載於張英陣校閱，**質化研究與社會工作** (頁 167-194)。台北市：洪葉文化。(原著 1998 年出版)
- Pratt, M. L. (1986). Fieldwork in common places. In J. Clifford & G.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ichardson, L. (2000). Writing-A method of inquiry.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pp. 923-948).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Inc.

- Ramon y Cajal Santiago (2000). **研究科學的第一步-給年輕探索者** (程樹德譯)。台北：究竟出版社。(原著 1897 年出版)
- Silverman, D. (2000).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A practical handbook*. London: SAGE.
- Weedon, C. (1994). **女性主義實踐與後結構主義理論**(白曉紅譯)。台北：桂冠。(原著 1987 年出版)。
- Webster, S. C. (1990).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t critique of surrealism and postmodernist ethnography. In M. Manganaro (Ed.), *Modernist anthrop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olcott, H. F. (1997). Introduction: A case study using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In R.M. Jaeger (Ed.), *Methods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 (pp. 365-369, 2nd ed.) Washington, D.C.: AERA.
- Wolcott, H. F. (1997). Ethnography research in education. In R. M. Jaeger (Ed.), *Methods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 (2nd ed.)* Washington, D.C.: AERA.
- Wolcott, H. F. (1995). *The art of fieldwork*. Walnut Creek: Altamira.
- Wolcott, H. F. (1998). **質性研究寫作** (顧瑜君譯)。台北：五南。(原著 1990 年出版)

Alternative Writing Styles in Educational Qualitative Research

Li-juing Wu*

ABSTRACT

The main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argue that the traditional format of academic reporting is only one of a wide repertoire of approaches that qualitative researchers may choose from. In other words, alternative writing styl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erve their legitimacy.

The *status quo* regarding the writing style generally used in educational qualitative research is reviewed in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paper. Next, several reasons such as functional considerations, the re-thinking of the nature of language, and power relationship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re given to justify the main arguments of this article.

Finally, the statement of Charles Handy that, "We may need an earth-quake," has been adopted as the challenge which concludes this article. In academic society, we may also need an earth-quake if our taken-for-granted assumptions are to be questioned.

Key words: writing-up, representation crisis, qualitative research, border –crossing in writing

* Li-juing W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National Taipei Teachers College.